

■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

关于政治文化与国际政治关系的再思考

李 兴

(武汉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李 兴(1966-),男,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国际问题研究。

[摘 要] 政治文化只为国际政治活动提供背景支撑与活动舞台。在政治文化与国际政治之间,政治文化既不是国际政治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两者并不构成因果关系。在全球化条件下,我们要提倡多元文化共存,反对文化民族主义。

[关键词] 政治文化;国际政治;信息;民主;人权;民族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04)01-0124-05

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是国际政治学中一个重要的综合性的研究课题。到底何谓政治文化?政治文化与国际政治的关系如何?本文力图在以前研究^①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考证、补充和发挥。

一、何谓政治文化

国际政治中的“政治文化”概念如同“文化”概念本身一样,有着突出的模糊性特征,国内外迄今尚无一致的看法。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 1956 年首先创用了这个概念。把政治文化运用到国际政治的研究当中,在西方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可喜的是,我国也有些学者在研究国际问题的过程中运用了“政治文化”这一概念和视角,做出了可贵的探索。有的以一个民族的群体政治心态,或该民族在政治方面的群体主观取向为研究对象,进而探讨政治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1](第 5-8 页);有的侧重于考察社会各阶层的政治信仰、理念、情感等方面对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的影响^[2](第 41 页);有的学者注重对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文化进行专门研究^②;有的把政治文化与民族性格结合起来,进而考察政治文化民族性的外在表现^[3](第 33-34 页);等等,不一而足。

笔者认为,国际政治意义上的政治文化,是直接地与国际政治有关的、广义的文化,除了一般所说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法律体系、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与国际政治直接相关的狭义的范畴外,还包括民族属性(血缘)、社会心理、国民性格、历史传统、民族自豪感、民族凝聚力、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甚至一定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地缘、气候、文明类型等可能与国际政治密切相关的范畴。政治文化与文化是有渊源关系的,但不是所有的文化都是政治文化,政治文化只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研究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整体相关文化,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民族国家特殊的文化存在方式。

二、政治文化与国际政治

政治文化有诸多因素。关于历史传统、民族性格、社会制度、宗教信仰、价值观念及经济、科技发展

水平等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言自明的，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承认的。本文的重点在于探讨知识与信息，民主、霸权与人权，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凝聚力等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

信息社会的知识爆炸，科技时代知识经济的来临，对国际政治将产生多方面复杂而又深刻的影响。一方面，传统的国家主权、安全、战争、国际竞争、综合国力、地缘政治等概念、范畴的内容和形式将发生相应的变化。国家主权要求不再像传统的那么刻板，而是变得弹性化和淡化。安全也不仅仅是原来意义上的军事安全和国家安全，而是还包括经济、文化、社会、信息、生态等在内的“综合安全”和“立体安全”。国际竞争和战争的胜负不再仅仅取决于军事力和经济力，而是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以知识和高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枪炮来无影，光电定乾坤”。传统的地缘政治的重要性逐渐让位于智缘政治。另一方面，知识经济对国际政治直接带来了负面性影响。它使人类长期生活在核战争的阴影和心理重压之下，计算机病毒和智能犯罪经常发生。人类的可持续性发展战略有可能遭到破坏，后代子孙的生存环境要承受巨大的牺牲。

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都是一把“双刃剑”，既构成难得的机遇，又构成严峻的挑战，有可能拉大世界上的贫富差距。知识经济使世界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政治上，都划分成核心与边缘、半核心与半边缘，从而使国际政治变得更加复杂、不稳，具有不可测性。

近年来，“民主和平论”(The democratic peace theory)在西方颇为流行。其基本理论观点是：民主国家由于有一系列制度约束，由于有民主规范和文化，从而造成民主国家间和谐的气氛。从历史来观察，尤其是当代国际关系的现实来看，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欧美地区)很少或者不易开战。当民主国家之间产生矛盾或摩擦时，它们很少或者不易威胁使用武力，而是采用和平的方式、“文明”的方式加以解决或调和；即使有一定程度的冲突，也多半被有效地抑制在战争的临界点以下。民主国家采取非民主手段对付非民主国家，但那是被迫的^④。与此同时，“霸权和平论”、“霸权稳定论”也有市场。这种理论认为霸权与国际稳定、国际和平之间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一个超级霸权国的存在有利于世界和平和经济繁荣，会在安全和发展两个领域起到积极的作用，因为霸权体系是一种稳衡体系^⑤。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空袭南联盟获得成功后，有人提出美国是一种与过去历史上霸权不同的“制度霸权”，即不谋求直接控制和支配，而是通过国际组织机构、运行规则、道德规范及自身榜样的作用而建立霸权，推行“民主”和美国的价值观，以使美国在保持世界霸权的同时避免被国际社会孤立的处境。也就是说，美国的这种霸权是充当全球的“平衡者”，因而具有一定的“合法性”。

尽管这些理论很多地方经不起严格的推敲，在实践中也未必经过验证，但从学术上讲，这些理论观点的提出既有一定的道理，也有一定意义，因为它们带来争论和启发，都提出了从政治文化(民主、制度、霸权、国际规则等)研究国际政治的新视角。当然，所谓“民主国家”也有各自的国家利益，这种利益不可能永远是一致的，有合作也有竞争。当它们的切身利益不可调和时，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很紧张的。历史上有过多次战争，现实中也是矛盾重重。如果说在冷战时期由于两极格局，所谓民主国家同属于一个以美国为首的阵营，它们相互之间的矛盾受到了压抑，被掩盖了；那么，冷战结束后，它们之间的矛盾甚至冲突逐渐浮出了水面。美欧日之间贸易战、情报战、人才和影响的争夺战愈演愈烈。美欧之间在许多重大的国际问题上意见相左。另外，依靠霸权维系的平衡与和平终究是暂时的、不稳定的、相对的，这是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发展的不平衡和大国之间力量对比变化所决定的。在历史的长河中，任何霸权只不过是短短的一瞬，而挑战霸权的力量往往始终是存在的。

至于谈到民族凝聚力，它取决于民族自豪感、民族自信心，民族的历史和光荣，辉煌与骄傲。民族是最深层次的文化，它深入人们的骨髓，沉淀入人们的血液。它们是爱国主义和民族自卫主义的力量源泉。民族凝聚力的强弱关系到该民族国家的生死存亡。中华民族之所以百年磨乱而不折，历经沧桑而不倒，就在于中华民族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自信心。

被称为俄罗斯“民族的良心”、“民族的主教”的索尔仁尼琴指出：“人民的精神生活比疆土的广阔更重要，甚至比经济繁荣的程度更重要。民族的伟大在于其内部发展的高度，而不在于其外在发展的高

度”。他认为如今能给俄罗斯人以力量、保证俄罗斯民族永远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也许只有俄罗斯文化^[5](P.202)。

民族凝聚力的反面是民族离心力,民族自豪感的反面是民族自卑感。它们造成民族分离主义和国家的分裂、瓦解,甚至招致外来的干涉,使本国的国际处境变得更加困难。前苏联的解体、前南斯拉夫的分裂、前捷克斯洛伐克的分家,就是明显的例子。

当然,民族自豪感走向极端就会走向民族沙文主义,民族凝聚力走向极端也会走向民族孤立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民族利己主义,无论是对于大国、强国,还是对于小国、弱国,都是不正常的、非合理范围内的,都会给国际社会带来灾难^[6](第 75-76 页)。国际恐怖主义的实质就是宗教民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恐怖主义的危害不在于其反霸和反全球化,而在于其严重违反人道、人性和人权。

冷战结束以来,人权、人道主义、新干涉主义作为新的政治文化,在国际政治中发挥了越来越突出的作用。由于冷战中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垮台,西方文化自认为具有某种相对的优势,西方“文化霸权”论颇有市场。佛郎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集中地表达了这种观点:西方式的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已经成为压倒一切的意识形态,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体制可能形成“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和“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这就是“历史的终结”,因为历史不再会发展出更新的形态。虽然福山并没有直接提出要采用“文化霸权”的说法,但其理论无疑就是说人类历史的发展只有在西方的历史中才能得到说明,西方的意识形态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终点。笔者认为,尽管人类历史的发展难免有曲折,但人类历史的发展总体上讲仍然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尽的过程。资本主义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它本身和人类发展的所有问题,相反,新的问题和矛盾总是越来越多,需要人类不断地去思考,去努力和去解决。因此,“历史终结论”是站不住脚的,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作为一种政治文化,人权有国际公认的规则,有受国际保护的一面,同时应与历史发展的一定的历史阶段相联系,与各国具体国情相联系。人权与国际政治的关系是复杂的、微妙的^[7](第 90-95 页)。有些国家利用人权、人道的幌子对别国横加干涉,甚至不惜采取“战争政策”,其实质是作为对自己霸权、强权欲望的文化补充,借人道而行霸道,藉人权而行霸权。过去主要表现在东西方关系上,冷战后主要表现在南北关系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而指责发展中国家的人权,甚至打出了人权高于主权、“人权无限,主权有限”的旗号。伴随着北约、欧盟的东扩,不仅西方的社会制度,经济模式,而且西方的文化,包括宗教(天主教、新教)、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也是全面“东征”,凯歌行进,咄咄逼人。这是新时代条件下西方政治文化张扬的表现^[8](P.111)。

意识形态是一种文化系统,观念就是武器。美国是最讲意识形态的国家,它不断地寻找敌人,从 20 世纪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到 21 世纪的“邪恶轴心”和国际恐怖主义。冷战后,美国明显地按照文明的亲疏远近划分圈子,如文明关系最近的英国和以色列就是“近亲”,德、法等是“中亲”,俄罗斯是“远亲”,以中国为代表的儒家和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国家则是“异己”。西方对前苏联东欧地区的政策也是很不一样的,北约、欧盟东扩首先吸收的是与西方文化和地缘上比较亲近的中东欧国家和波罗的海三国,其对独联体成员国的政策更是服从于对俄罗斯整体政策的需要。美国决意“改造”伊拉克和阿拉伯世界,在巴以冲突中明显地偏袒以色列。这些既反映了它在反恐和人权等问题上采用了多重标准,也体现了它政治文化的霸气十足。

三、小 结

在国际政治中,政治文化是个“软权力”,在国际社会中能产生亲和力或排斥力。政治文化诸要素既不是同时起作用,也不是平均起作用,它们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在一种情况下以这种因素为主,在另一种情况下以另一种因素为主。国际政治中政治文化诸因素的作用也是分层次的,民族自豪感、民族凝聚力、社会心理、国民性格、历史传统的作用要比知识和信息、霸权和人权更有

生命力。深层的心理结构要比物化的政治文化更恒久。文化比民族国家、政治制度更基本，也更持久。如犹太国家(以色列)历史很短，而犹太教和犹太文化却源远流长。

政治文化的不同要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充当“亮点”的顺序是不同的。在工业社会霸权的作用重大，而在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条件下，知识与信息的作用占先。而民族感情是任何时代任何条件下都起作用的重要因素。

受意识形态和冷战思维的影响，过去人们只重视军事、经济、资源等“硬权力”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政治文化这个“软权力”的作用长期遭到了掩盖，受到了学者和政治家们的忽视。它似乎是看不见的，摸不着的，但又是客观存在的。作为一种潜流、资源政治文化对国际政治、国家关系和民间交流仍然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和影响。其作用是客观的、恒常存在的，不可忽视的。

由于国际政治的状况是多种复杂的因素决定的，政治文化只是其中的一种因素，并且往往是隐藏在背后的，其作用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决定性的。西方学者敏锐地抓住了冷战后政治文化因素上升的趋势，但他们往往走向了极端，过于夸大了政治文化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或者说把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上升为政治文化，把政治文化又直接与现实政治挂钩，从而使政治文化的研究进入了歧途。在政治文化与国际关系之间，政治文化既不是国际政治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两者并不构成因果关系。政治文化只为国际政治活动提供背景支撑或活动舞台。这是当今国际政治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重要的视角。因此，当我们认识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这是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之间的一场战争，尽管不乏有人希望如此。

本来，各民族的文化都是世界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共同构筑世界文化的宝库；而世界文化又是由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构成的。文化“多元共生”、“文化对话主义”才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正确道路。只有最有民族性的文化才最具有世界性。那种只希望本族本国、血缘文化一枝独秀，以保持对世人的优越和强势的想法是狭隘的。为此，必须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沙文主义，克服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提倡多元文化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共存共荣，避免文化误读和所谓的“文明冲突”。

我国有学者提出了“大文化时代”的概念，即“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以及在此文化基础上诞生的各个领域与方面展开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广泛交流、沟通与联系”^[9]（第162页）。因此，我们应当积极参与国际文化交流，平等对话，促进中外文化融合，洋为中用。我们提出政治文化概念的目的，是为了适应国际形势变化的要求，更好地开展政治学、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而不是贬己扬人，妄自菲薄。同时，我们也要警惕打着人权、人道等各种旗号的文化渗透、干涉和侵略，反对文化帝国主义。

当然，在当今国际政治中，打文明牌的不只有美国一家。还有人企图利用文化问题做文章。多年来，日本政府缺乏诚意向亚洲遭其侵略的国家公开道歉。日本有一部分势力甚至堂而皇之地认为，日本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所以出兵东亚，是为了挺身而出保卫亚洲各国免遭西方文化的侵略，从而保卫亚洲文明。无独有偶，日本史学家入江昭在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美战争时说：“日美战争不仅仅是侵略和抵抗之间、军国主义与世界和平之间的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它又反复暴露出另一个问题”，日本“想使欧化的亚洲再度亚洲化”，公开为日本军国主义暴行辩护。^[10]（第147-148页）日本的这种所谓民族“责任心”和民族自豪感不是过于膨胀了吗？对于此类政治言论，难道我们不应该保持高度的警惕吗？

注 释：

① 李 兴：《论国际政治中的政治文化因素》，《欧洲》1998年第1期。

② 赵宝熙：《“和为贵”、“中庸之道”与“武士道”精神——关于日本政治文化的思考》，《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李兴：《冷战时期苏联与东欧关系中的政治文化因素》，《北大史学》第4辑（1998）。

③ 李 兴：《论国际政治中的政治文化因素》，《欧洲》1998年第1期；See, for example, Yosef Lapid and Friedrich Kratochwil(eds), *The Return of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IR Theory*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7); Peter Katzenstein, *Culture Norms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lice and Military in post-war Japa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Peter Katzenstein(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 Foreign Affairs, Volume 72, No. 3.

- ④ 参见 Bruce Pussset, Politics and Alternative security: inword a more democratic , Therefore more peaceful world; . Burns H. Weston, ed: Alternative security: Living without nuclear deterrence, westview Press 1990; Jeffrey ° D ° Sachs, Consolidation Capitalism, Foreign policy, Spring 1995; Edward ° D ° Mansfield and Jack Snyder, Democratization and war, Foreign Affairs, V074, No3, 1995.
- ⑤ 参见 Robert C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81); Charles Kindleberger, the World Depression, 1929—1939 (Bereley : U of California P, 1971); Stephen Krasner, Defending National Interest: Rraw Materials Investment and US Foreign Policy (Olic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p, 1978; George Modelski and Willian Thompson, Seapower in Global Politics, 1949—1993 (Seattle: U of Washington P 1988; A ° F ° K ° 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icage: U of Chicago P, 1988)。

[参 考 文 献]

- [1] 高 毅. 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1.
- [2] 冯绍雷. 国际关系的转型与转型中的国际关系研究[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1995, (2).
- [3] 徐大同. 政治文化与民族性的几点思考[J].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 1998, (4).
- [4] П.Е.Смирнов. Есть ли у Атлантического мира ?США и Европа[M]. Москва : наука, 2000: 82-106.
- [5] А. СолмениУын . Россия В Обвале[M]. Москва, 1998.
- [6] 李 兴. 论国家民族主义概念[J]. 北京大学学报, 1995, (4).
- [7] [英] R.J.文森特. 人权与国际关系[M]. 凌 迪, 等译. 北京:知识出版社, 1998.
- [8] К.Саломон . Кул турная Экспансия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глобализация [J].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 шения, 2000, (1).
- [9] 高志其. 大文化时代[J]. 新华文摘, 1995, (1).

(责任编辑 叶娟丽)

Rewiew on Relations Between Political Culture &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I Xing

(School of Politics & Public Administr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LI Xing (1966-), male, Doctor, Professor, Doctoral supervisor, School of Politics & Public Administration,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culture, which has been put forward in my previous article “On the Political Cultural Element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ublished on “Europe”, 1998, No1), this one further elaborates the role of political cultural elements such as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democracy, hegemony and human rights, national pride and national cohesion in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s well as their influences and characteristics. The writer believes that political culture provides a background and arena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o play. The former is neither a sufficient condition nor a prerequisite of the latter, and there is no causality between them. Cultural nationalism should be opposed and cultural diversity and co-existence of differences should be advocated in the globalization condition.

Key words: political cultur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formation; democracy; Human rights